

董仲舒小传

董仲舒，广川（今河北枣强）人，约生于公元前198年，约卒于公元前104年，是中国汉代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、政治家。

董仲舒在汉景帝时被授予博士，宣讲《公羊春秋》。汉武帝元光三年（前134年），他在著名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中，提出哲学体系的要点，并提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被汉武帝采纳。

后来，董仲舒任江都易王相，配合蜀王刘非治理江都国，三四年内，把江都国百官治理得服服贴贴。元朔四年（前125年），任胶东王刘瑞的国相，后辞官回家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此后居家著书立学。

每每朝廷有重大议事，使者及廷尉就去他家求教，他的意见武帝十分尊重。武帝时代，正是汉代较为繁荣的时期，文化和自然也相应较发达。西汉前期，文学和音乐等方面都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。汉武帝亦喜欢诗歌和音乐，他特别设立了一个机构——“乐府”,专门负责收集诗歌，配制乐谱，训练乐工，演唱歌曲。汉朝的乐府诗，是我国历史上一支灿烂的花朵。乐府诗的主要内容有反映民间疾苦的，有揭露上层奢侈生活的，有描写爱情生活的，也有鼓励人们奋发上进的。

另外，汉武帝还喜欢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，叫做“辞赋”，以至于能与汉武帝谈论辞赋的人，纷纷进入朝廷做了官。如司马相如写的赋，文字优美流畅，描写细腻敏感，立意新颖独特，是当时最负盛名、最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。西汉的著名辞赋家，还有枚乘、贾谊、杨雄等人。

董仲舒除了著述甚丰之外，更多的时候多以做学问影响后人。据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记载：“凡百二十三篇”，外加解说《春秋》的《玉杯》等几十篇 10 万余言。另有《春秋繁露》及严可均《全汉文》辑录的文章两卷。后人称仲舒为“董子”。

董仲舒曾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为一体，并吸收法、道、阴阳家思想，建立了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，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，对当时社

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、政治、社会、历史问题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答复。

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，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。他认为阴阳四时、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，天的雷、电、风、雨、露、霜、雪的变化，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。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，认为天任阳不任阴，好德不好刑，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。董仲舒给天加上了道德的属性，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、有目的的活动，甚至日月星辰、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。

董仲舒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天人关系问题。在探讨这一问题时，他颠倒自然和精神的关系，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体系。

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：一、神学的灾异谴告说。灾异谴告，被人认为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。二、“天人同类”、“天人相副”说。认为“天有阴阳，人亦有阳阴，天地之阴气起，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。人之阴气起，而天地阴气亦宜应之而起，其道一也”（《春秋繁露·同类相召》）。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。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，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，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。

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，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。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，是天的副本。他说：“天

地之精所以生物者，莫贵于人。”他比附说：“天二，有阴阳之施，身亦二，有贪仁之性。”他还指出，人与禽兽不同，具有先天的善质，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，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性之善。董仲舒将人性划分为“三品”，认为“圣人之性”是善性，“斗筲之性”是下愚者，都不可以明性；只有“中民之性”才可以明性。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“中民之性”，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。

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，形成了一套以“三纲”“五常”为核心，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、理论化的伦理体系。他认为道德是“天意”、“天志”的表现。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，董仲舒把人性看作是人“受命于天”的资质，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“性”与“情”两个方面。他认为，性表现于外则为仁，可以产生善；“情”表现于外则为贪，可以产生恶。因此，必须以“性”控制“情”，“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”。天性虽然体现了天，可以产生善的品质，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，只有接受“圣人”的道德教育，然后才可以为善。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“堤防”，阻止“奸邪并出”。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、孟子的义利观，提出“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志不计其功”的主张，强调义重于利。在志与功的关系上，他强调志，主张“本其事而原其志，志邪者不待成”，认为动机（志）不善就可以惩

罚，不必等到酿成事实。

董仲舒所建立的伦理思想体系，反映了加强君权、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，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。但体现在他的伦理思想中的“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”，却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精神枷锁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在历史观方面，董仲舒认为，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。每一新王受命，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这叫新王必改制，但是“大纲人伦，道理、政治、教化、习俗、文义尽如故”，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，是不能改变的。“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易道之实。”这种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形而上学思想，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，起到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。

董仲舒生活的时代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，阶级矛盾日益剧烈。官僚、贵族、侯王凭借封建特权，对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，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。针对这些情况，董仲舒提出“限民名田，以赡不足，塞兼并之路；盐铁皆归于民；去奴婢，除专杀之威；薄赋敛，省徭役，以宽民力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。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，节约民力，保证农事，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，以缓和阶级矛盾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，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，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。因而被尊为群儒首，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。

董仲舒收了很多弟子，据说超过了孔子。后来从师于他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他就让自己的弟子教新弟子。因此，董仲舒的许多弟子从未见过老师。

董仲舒的弟子都说，老师一做起学问，对眼前的一切琐事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他家里有个美丽的园圃，弟子们课间休息时，都到那里游玩。可读书 3 年，没有人在花园看见过董仲舒。古人盛赞他“三年不窥园”。

尽管如此，弟子们都很尊重他，因为他的一言一行，无不符合儒家规范。公元前 140 年，年仅 16 岁的刘彻即位，这就是有名的汉武帝。他雄心勃勃，不甘心简单按父辈惯例治国。他认识到治理好国家，要依靠一批知识精英替他出谋划策。于是他下诏，在全国选拔“文学贤良”,也就是文学家、思想家。

各地官吏推举了一百多名文人学者，集中到京城，由汉武帝亲自考试。在朝廷的 3 次考试中，董仲舒出类拔萃，一鸣惊人。

第一次考试，武帝问他：“怎样才知道一个国君是否把国家治理好了？”

董仲舒说：“‘天人感应’。如果国君按儒家礼乐教化治理国家，那么就会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；如果君王

暴虐，那么老天爷就会降灾祸给他，提醒他改恶从善，否则就有亡国之祸。”

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，不禁回想历代君王，还真有些道理。他觉得董仲舒是个难得的人才。为了进一步了解他，武帝又破例对他进行第二次考试。这次武帝问他怎样才能管理好国家。

董仲舒回答说：“管理国家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吏，他们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国家的兴衰。因此有必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去管理国家。具体的方法是每年地方推荐几个人选，由皇上考察、任命。”

汉武帝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比世袭制可靠多了。最后汉武帝又忍不住问了第三个问题：“我们国家应该用哪一种思想教育百姓呢？”

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”董仲舒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，“儒家学说总结了历史上明君治国的礼法，是圣人受上天的启示而创立的。所以天不变，这种治国之道也不该改变。”

武帝被董仲舒的学问迷住了。他想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没有大一统的原则思想，结果导致连年战争。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建成统一的大国，决不能让各种异端邪说泛滥，蛊惑人心，犯上作乱。就这样汉武帝与董仲舒一拍即合，他遣散了其他学派的学者，不准他们著书立说，只重视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学。从此，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就成了封建中国的正统思想，一直

延续了两千多年。

朝廷殿试后，武帝本想重用董仲舒，可太后偏偏崇尚“黄老学说”，对董仲舒不感兴趣。武帝刚继位，根基不厚，不敢得罪太后，只好让董仲舒暂去江都辅佐他的哥哥易王。

易王刘非，生性勇猛，骄横跋扈，但他对武帝派来的这个正派读书人还是很敬重的。董仲舒常给他讲些儒家礼学，劝他不要专横暴虐，渐渐地易王竟有些开窍了。

在辅佐胶西王刘瑞时，董仲舒给刘瑞讲古代三皇五帝如何仁义。刘瑞就反驳说：“越王勾践依靠大夫泄庸、文种、范蠡灭了吴国。我看这三个人一点不比那三皇五帝差，为什么不称他们为贤人呢？”

董仲舒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当年鲁国国君问贤者柳下惠：‘我要伐齐国，你说如何？’柳下惠不假思索地说：‘不可！’柳下惠回家后，十分忧郁，自言自语道：‘我听说攻伐之事不可以问贤者，鲁君问我，可见我还不够贤。’你看，柳下惠以谈攻伐之事为耻，何况越国三大夫还设计伐吴国呢？！所以越国确实没有贤人，贤人都重义轻利。孔子门下，连五尺儿童都精于谈论春秋五霸。五霸比起三皇，就像武夫比美玉一样。”

胶西王听到这，不由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太好了，我今后一定学三皇而充五霸。”

董仲舒在长期继续钻研他的阴阳灾变、天人感应学

说，并找机会向武帝灌输，想得到武帝重用，不料差点为此丧命。

公元前 135 年 4 月的一天，汉高祖的陵园起火，6 月辽东的高祖庙又发生了火灾。满朝上下都为这两次火灾忧心忡忡。董仲舒听说后却很高兴，他认为这是宣扬灾变学说的良机。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论文，以这两次灾变为根据，评说了一番朝政。主旨是说，火灾的起因，是汉朝建国几十年了，还没把儒学彻底定为至尊。因此，上天不满，降灾惩戒。

论文写好后，董仲舒心中好不得意，就出门散心去了。恰巧中大夫主父偃来找他，看见桌上的论文墨迹未干，就凑上去阅读。这个父偃与董仲舒面和心不和，他见董仲舒写了如此大胆的文章，就想趁机奏一本。

主父偃偷走了文章，交给武帝。武帝本来可以接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，但落实到自己头上了，就有些不快了。他召集群臣讨论这篇文章。群臣一是嫉妒董仲舒的学问，二是想讨好武帝，纷纷指责他胡言乱语，诽谤朝廷。结果董仲舒被抓进监狱，判了死罪。

幸好汉武帝念他是当世名学者，并且自己正在提倡儒学，怕杀了儒学大师，与己不利。就这样，董仲舒免去一死，但被降职为中大夫，调离江都。从此，董仲舒再不敢公开谈灾变论了。

后他又做了四年胶西王刘瑞的相国，于公元前 121 年辞职回家。董仲舒回到老家广川后，集中精力研究

《春秋》，写下了著名的《春秋繁露》。在这部著作中，他又系统地宣扬了“天人感应”、“三纲五常”等封建伦理观念，此书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儒学大百科全书。约公元前 104 年，他郁郁死于家乡，享年 94 岁。

董仲舒发展、完善了儒家学说，并通过汉武帝使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。从历史上看，这对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，至于那些封建伦理观和迷信思想，则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。

董仲舒所处的时期，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阶段。他的哲学思想适应了这一发展的需要，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；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趋于保守，他的哲学——神学理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。



无奈悬车著书

董仲舒本是个激进的儒家思想家。他虽然被开明的汉武帝赏识较迟，官运来得也晚，但他的天人三策是充满着敦促武帝有为而治、强勉努力的自强不息的儒家思想的。

董仲舒初入官途，虽未被重用，但在江都任相期内，他充分地显现出大家风范，为民风尘仆仆，深得人们的爱戴。几经周折，几经风雨，董仲舒英华已逝，顽固的影子也在他身上显现出来。他也建议胶西王刘端正其义而不谋其利，明其志而不计其功。这一方面表现出董仲舒的矛盾：由效忠而差点送命，再想有所作为而被坏人支使。他深觉自己的无能为力和被动。另一方面其实还是体现了他的爱国报效之心。他虽深知刘端的恶习,但是他也熟谙为臣之道;“为人谋而不忠乎?”(《论语·学而》）董仲舒在挽救自己的同时，也在挽救刘端，希望他不要走淮南王、衡山王的路。

董仲舒机智的答对虽然总算躲过了刘端的发难，但他仍是心有余悸。是年，董仲舒已经 70 岁了。“古者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十，悬车致仕。”（《汉书·韦贤传》）董仲舒思量自己已逾古稀，再回顾自己官场的艰辛，空有满腔报国之志，终不能实现。不是有小人嫉己之才，就是伴君如伴虎，终日提心吊胆，不知魂归何处。

董仲舒思量再三，以为命该如此。董仲舒感到心力憔悴，仕途已尽，不如早日退职隐居，潜心研究学术。于是，他便给武帝提出辞呈，申明自己年老体弱多病，力不从心，只想归居勉力报国，尽一份悠悠的余热。汉武帝并未挽留，刘端也不勉强。董仲舒亦如释重负，脱离险境似的官场。

从此以后，董仲舒居家修身养性，亦关心国家大事，也不违“谋道不谋食”的古训。当然，看来董仲舒辞官后的退休金已很丰厚，根本不用他去为家庭经济开支劳神。当然，也可能俭以养廉，省吃俭用而已。他的子孙都能学而优则仕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
于是，董仲舒一心研究和著述，同时可能还教几位学生，朝廷上一些疑难杂症也都来找他这位不怕死的老骨头。董仲舒的著作主要在他辞官居家后写就，这些著作是他一生研究的总结，其中也可能有他当初的讲稿，后来被修订而编订进来。

其实，董仲舒是出于不得已，才借口年事已高、体弱多病而给汉武帝上书，违心地请求辞职归退。然而，他却如“愿”以偿。

其实，董仲舒上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，他是想给汉

武帝提个醒，暗示武帝任用不当，耽误自己的前途，能否调个地方。所以，自上书之日起，董仲舒心中就在思量，武帝是否能明了自己的用意。然而，汉武帝不知是根本就没有去想，还是觉得董仲舒已无留用价值，就做个顺水人情，免得在眼皮底下增加麻烦。于是就同意了。

董仲舒接到圣旨——准奏之时，心情很是复杂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不知是为国家还是为自己，不知是轻松还是心酸。

辞官归居，确实无官一身轻，不要再去周旋，不要再去提心吊胆，不要再奴颜卑膝、察颜观色，以后便可以想自己所想了。然而，人始终是一类喜欢自讨苦吃的动物。董仲舒的心底还是泛出一股酸酸的失落感。

本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加之人总在该真正轻松之时心情并不轻松，所以他心中滋生出那远离尘嚣喧闹环境后又对尘嚣的渴望。实质上，董仲舒对汉武帝有一种偏执的认识，就是武帝是位有所作为的皇帝，他是能任用有才能的人的。他也相信武帝是能欣赏自己的才能的。然而他确实估计错了。飘渺的渴望与无助的现实相去甚远，内心是失望，深深的失望。

董仲舒辞呈准奏，在同僚们看来是件幸事。董仲舒也装出一副轻松而满意的样子，四处和朋友、同僚们招呼告辞回家。董仲舒自然也要和胶西王告别。胶西王也不勉强挽留，只是关照地说了几句客套话，要董仲舒多

保重身体。其实董仲舒的身体还挺硬朗，辞归之后，他还活了 20 年。

董仲舒回到相府，随从们已知主人的辞退得准之事。董仲舒又跟大家做了说明。当天晚上，相府里就忙开了，大家整理行囊，准备回家。董仲舒是个清廉之人，又终不肯治家产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家当，也就是随身带的几套衣裳。要说他确有家当的，那就是书。当时的书还主要是竹简，很重。董仲舒的家当几乎全是书。

董仲舒来胶西国时间不长，只有一、两年。在位期间，董仲舒对来胶西国本就有点不愿意，加上胶西国荒废多年，虽然董仲舒上任后曾给胶西带来一些起色，但毕竟积重难返，工作并没有完全铺开。后来胶西王刘端向他请教“仁”，似有谋乱之意。董仲舒便匆忙辞官，怕受连累。

董仲舒没有为胶西国挥泪而别的场面，但他却是满怀失望和忧伤的。董仲舒和随从们登车上路，由胶西国向京城进发。

路上，董仲舒少不了顺路游览，没有什么事也不用着急，反正只是回家。董仲舒又与其他人不同。他一路上看到紧张而勤勉的人们，就想到自己就此可能再无报效祖国的机会了，心中很不是滋味；再联想自己一生的追求，只落得一事无成，心中更是不服。

年少就喜好《春秋》，并兼学了各家学说。然而，

由于时世的变迁，儒家思想在当时并不受欢迎。儒学终被政府看作是一门学问时，自己虽被景帝授予博士，却未被任用。当时除了自任才疏学浅，继续钻研之外，其他本不能去想。回乡钻研学问多年，又兼传授春秋公羊学，终得以在元光年初声名大振。然而，武帝又没有真正重用自己。远去江都国，带着初入仕途的浓烈情趣和报国尽忠的满腔报负，与易王刘非有着非常愉快的合作。结果却并非尽如人意，虽得江都国人民的拥戴，却被不明不白的废黜——降职为中大夫。

董仲舒神情忧伤，心中似有不吐不快的怨愤。他才思泉涌，神志迷离。到家的当天晚上，董仲舒就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士不遇赋》。

董仲舒的忧伤和失望的痛苦，尽付笔端，令后来人大为慨叹！

他首先回顾了一生所求：时运来得太迟，却又去得太急。自己的坚执性格，又不想屈意逢迎，故仕途坎坷。不知不觉已过古稀之年，再去努力，已太迟了。想自己一生，不懈追求的并不是某种功利，只是为了忠心报国；结果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少耻辱，伤害了自己的一身正气。他自叹、自悔，也许还是足不出户的好啊，因为这样也许就不会有什么过错了。

若真把自我封闭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但董仲舒认为自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：三代之末世。世风不古，坏人当道。坏人以狡辩和欺诈横行社会，他们指白为黑，

鄙视真、善和美的东西。忠贞之士坚持耿直、正义却反而是作茧自缚。他们不想同流合污，一日三省于身，企求真理的显现，企盼某一天能使天下人都为仁为善。然而，即使鬼神也不矫正那些暴戾之人的品行，圣贤也不能开导他们的违心和迷惑。即使这样，忠贞之士却又不得不与他们同在一个太阳之下，刚正的性格也为他们所不容。董仲舒慨叹道：人生之路何其难啊！真不知何去何从？

董仲舒由人世的艰难，联想到古代的清廉之士。殷商的卞随和务光，周武时的伯夷和叔齐。他们四人都愤世嫉俗，不容社会恶习，终只得遁迹于深渊，隐身于山林。后来又有伍子胥和屈原，他们亦是不与媚俗同流合污。学习他们的样子吗？可惜时世已变，恐怕他们那时的方法也不能在现今社会践行。唉！天下之人皆违背正道，我还能与谁同归呢？

董仲舒并没有就此而认为自己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他有他自己的选择。他认为不如做一些平常的事，不要去追随世俗的轮回。因为虽然矫情可获百利，但它哪里比得上修正身心做一些善事呢？大家不要以为我偏执。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，并不是我禀性偏狭。天下道德刚建而文明，应天而行时的人还是很多的，这并不是我董仲舒一个人所能张扬的。只是我虽然鬓发斑白，但我依然有一颗追求真、善、美的信心。

董仲舒大力在天下确定真、善、美标准的雄心。他

的颓伤本不出于功利的目的，仕途的曲畅与否仅是个“学而优而仕”时代的情面问题。他执著地坚守着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儒家精神。

当年，孔子周游列国数十载，其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；为了实现儒家大道，屡穷而不息。他自知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。”(《论语·微子》) 所以，当他和弟子们在陈国遭围困十多天，弟子们饥饿交加，面如菜色。孔子坚持对百姓秋毫不犯。这时，子路很不开心，他问孔子道：“先生，君子也会遭遇穷途末路的时候吗？”孔子平静地说：“是的。但君子能坚执地固守自己的处境，而小人就不行了，小人会无所不为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 这是说，君子仁人的品行端正不在表面文章，即使在穷困潦倒之时，也一样坚执地追求仁义；只有小人会在那种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
董仲舒在赋的最后部分再次阐扬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精神。他也甘心在世风日下的时代正心归善，做哪怕是一丁点儿善事，而不去同流合污。

董仲舒的《士不遇赋》实质是通过抒发胸臆，确立他晚年的人生观。为了真理，即使自己受点屈辱又会怎么样呢？把余热献给国家，做一点善事，这是董仲舒的心愿。所以，董仲舒晚年虽然归退，但他仍热心地关切国家大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